

主編・陳興唐／編輯・戚如高 馬振犢／審校・萬仁元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台灣「二·一八」事件 檔案史料（上卷）

解說・吳克泰 周青

機密
極密

機密
極密

人間出版社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

回主編／陳興唐 回編輯／戚如高·馬振犢 回審校／萬仁元

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

人間出版社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

檔案收藏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主編 陳興唐

編輯 戚如高·馬振犢

審校 萬仁元

封面設計 許南村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陳映真

社長 陳映和

地址 台北市潮州街九一—九號五樓

電話 (〇二)三二二三五七/三二二二三五八

郵政劃撥帳號 一一七四六七三·人間出版社

印刷 漢陸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一九九二年二月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代理 流通書報行銷公司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三七二巷二七弄九四號

電話 (〇二)二七二三六九六三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比較、分析、去偽存真

吳克泰

——在南京看到的「二·二八」檔案

最近有機會到南京，聽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設在南京，專門保存和研究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檔案）已經把有關「二·二八」事變的檔案整理出來，便抽空去借閱。

這些檔案原來都夾雜在原南京政府各部門的檔案中。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工作人員花了很大力氣，把所有檔案清理了一遍，從中把有關「二·二八」的檔案一件一件地收集起來，集中在一起。雖然這部分檔案的份量不大，但整理所花費的工夫應當是不小的。現在海內外的專家學者、有關的機構，尤其是廣大台灣民衆都十分關心「二·二八」問題，希望能夠儘快恢復「二·二八」的本來歷史面目，使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中所受的冤屈能得到平反。因此，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稱贊的。

筆者在台北從頭到尾參加了「二·二八」鬥爭，是「二·二八」的目擊者和倖存者。筆者看了這些檔案以後發現，許多帶關鍵性的反映真實情況的檔案，要麼被國民黨帶走，要麼乾脆就沒有，相反地，為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辯護的歪曲事實的檔案倒比比皆是。但不管國民黨如何掩蓋，經過比較、分

析和去偽存真，還是可以看出真相來。爲了便於讀者研究和分析這部分檔案，我願意結合我的親身經歷，提出一些重要問題和線索，供讀者參考。如果這樣能對「二·二八」的平反有所幫助，則幸甚。

第一個問題：「二·二八」是怎麼發生的？

無論是楊亮功、何漢文的報告或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都突出強調兩個原因，一是台灣民衆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很深，祖國觀念薄弱；一是「共黨的乘機煽動」，甚至說「奸黨於發動之前早有相當準備」。這些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如果說台灣民衆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很深，祖國觀念薄弱，那麼光復當初，台灣民衆萬人空巷，簞食壺漿迎接「國軍」的那種空前熱烈的場面又作何解釋？當時家家戶戶都焚香告慰祖先的動人情景，人們至今仍記憶猶新。至於「奸黨於發動之前早有相當準備」這一點，在檔案中以及其它任何方面材料中都找不出根據，因爲這是子虛烏有。楊亮功、何漢文的報告也承認，當時「共黨人數甚少，亦無控制全局的力量」。這個估計倒是合乎實際情況的。上述兩個報告中均提到謝雪紅、林日高、潘欽信、蘇新、王萬得、張道福等日據時期共產黨人的名字，似乎這樣就可以證明是共產黨在煽動，但這是無濟於事的。因爲懂得台灣歷史的人都知道，日據時期的台共叫做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早已在三〇年代初被日本警察徹底破壞，後來再也没有重建過。「二·二八」時，他們都不是中共黨員，都是非黨人士。至於報告中所指的台灣省工作指導團、中共東南區第七連絡站、閩台政治組、台灣共產主義青年團等所謂中共非法組織，根本就不存

在，都是有意捏造出來的。

上述兩個原因都不能成立，「二·二八」發生的真正原因只有到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中去尋找。楊亮功、何漢文的報告中提到物價高漲與失業增加之影響、政府統治政策之失當、一部分公務員貪污失職及能力薄弱之反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情況。但均輕描淡寫，實際情況是非常嚴重的。「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並非偶然。台灣社會危機已醞釀了一段時間。第二檔案館的檔案中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抄送給行政院的《台灣現狀報告書》。這個報告寫於「二·二八」前一年多。報告書一開頭就強調：「自日寇投降，台灣得以收復後，台胞歡喜情緒特別深刻，感謝祖國再造之恩，尤為熱切，故擁護政府無微不至。最近熱情漸轉冷淡，由熱烈歡迎而冷眼旁觀。此間變化，值得祖國注意，設法補救，以免貽患將來。」這個報告書中提到「物價蒸蒸日上，公定米價已漲七倍，肉價亦漲四十倍以上」，「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顧人民福利，連日人留予台胞謀生之商業亦剝奪淨盡，此使台胞感覺祖國之剝削有甚於日寇」，「百業停頓凋落，失業工人已在二十萬人左右」，「農村破產農民生活堪慮」，「海內外台胞救濟刻不容緩」。這個報告書的結語寫道：「以上所舉各點，僅屬台灣之一端，若任其自然演變，將來之結果誠不堪設想」。可以說，這個報告書相當深刻地反映了台灣社會的危機，並預先警告了「將來之結果不堪設想」。這個報告書還鄭重其事地由行政院批給內政部、財政部、司法行政部、經濟部等部長及善後救濟總署核覆。

當然，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改的本質不會因為一件報告送到行政院而改變。報告歸報告，好（貪）

官我自爲之。當時台灣的國民黨官僚貪污腐敗、欺壓百姓愈演愈烈。到了「二·二八」前夕，發生了著名的貿易局長于百溪、專賣局長任維鈞、台北縣長陸桂祥的大貪污案。于百溪和任維鈞案發後仍逍遙法外，陸桂祥的台北縣政府在追查前夕發生「怪火」，所有貪污證據都毀於一旦。見此情形，羣情激憤，輿論大嘩。這時，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引起猛烈的通貨膨脹，上海的經濟危機迅速影響到台灣。台灣物價直線上升，失業者越來越多。號稱米倉的台灣竟鬧起了米荒，各地發生搶米風潮。因斷炊而全家自殺的事件時有所聞。「二·二八」之前在台灣採訪的南京、上海的記者，對於這種危險情況已經作了如實報導，驚呼：「春天到了，台灣百病齊發」，「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第二檔案館的檔案裏有張琴、楊風等人寫的報導的剪報材料，都說明了台灣已到民怨沸騰，一觸即發的地步。這是發生「二·二八」的基本原因。忽視這一點或模糊這一點，「二·二八」就成爲不可理解的事情。

「二·二八」的導火線是由一批專賣局的緝私警察打昏售烟攤販林江邁老嫗，在逃跑中又槍殺路人陳文溪而點燃起來的。憤怒的羣衆湧至警察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事員警予以懲辦。關於這一點，各方面的材料都是一致的。但是，楊亮功、何漢文的報告緊接著提到「結果將葉德根等六人送憲兵隊看管，旋即轉解台北地方法院訊辦」。這個提法是很有問題的。這在當時是沒有任何官員交代，也沒有任何人證實的。羣衆在憲兵隊門前整整等了一個晚上。如果當時有負責的官員出來表示道歉，表示已經移送法院，一定要嚴辦，事情也就不至於鬧得那麼大。正因為國民黨當局採取敷衍羣衆的態度，

方有第二天即二月二十八日羣衆的大規模請願遊行。羣衆向長官公署的請願本來是和平的，羣衆雖然很氣憤，但無非是要求嚴辦肇事的凶手。當時羣衆的隊伍尚未越過長官公署前十字路口的圓環，離長官公署尚存一、二百米之遠，衛兵事先沒有警告即從長官公署陽台上向手無寸鐵的請願羣衆開槍掃射。羣衆當場死傷數十名，這是對羣衆的怒火火上加油。憤怒的羣衆佔領了電台，登高一呼，全台灣各地的民衆就紛紛起來響應了。這是很關鍵的一點。國民黨方面的檔案極力掩蓋和歪曲這一事實，甚至說，「暴徒衝進了長官公署，衛兵方被迫開槍」，這是別有用心的。當時在場的人現在在北京就有三位，都可以證明當時的實際情況。

「二·二八」當天下午，長官公署宣布戒嚴，入夜即到處槍殺路上行人。第二天，國民黨軍憲又在市內各處向羣衆射擊挑釁。下午在北門鐵路局附近向羣衆猛烈掃射，打死數十名。筆者當時在延平北路目睹了這些被害羣衆的屍體裝在幾輛卡車上被運走的場面，其慘狀實不忍睹。台灣當局不但不採取措施來抒解羣衆情緒，反而不斷槍殺民衆，進行挑釁。所有這些都是使事態進一步擴大，並促使羣衆自己起來武裝自衛的原因。

「二·二八」是羣衆自發的，事先並沒有任何人策劃，是官逼民反，正義是台灣人民方面。這一點必須肯定，否則「二·二八」就無從平反。

第二、外省人受到台灣民衆毆打及物質損失問題。

台灣民衆最痛恨的是吸吮民脂民膏的貪官污吏，這些貪官污吏都是來自外省，因此當羣衆起來鬥爭的時候，一時情緒衝動，在懲罰貪官污吏的同時，也誤打了一般外省籍公教人員。台灣民衆自己也很快認識到這一錯誤，迅速加以制止了。許多外省籍公教人員、商人、學生都受到台灣同胞的保護。第二檔案館的不少檔案都說明了這一情況。如台北招商局人員受到公寓負責人莊梁材的細心保護和照料；台北鹽業辦事處人員受到台籍員工的保護；中國石油公司駐台北人員受台省同仁維護等等。從楊亮功報告附件中，還可以看出，外省公教人員死亡人數很少，除台北市死三十三人，基隆市死四人，台中市因傷致死四人，嘉義市死一人，高雄市死三人，屏東市死一人，台東縣死一人外，台北縣、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縣、花蓮縣、澎湖縣的外省同胞均無一死亡者。

關於外省公教人員物質損失報告附件申報數字大得驚人。關於此事，台灣軍方出的《正氣月刊》四七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署名遊客的「台灣別記」中，有如下的敘述：「外省公教人員在這次台變中受損失的很多。但報告損失的價值數字不完全是事實，損失了數十萬的也只能（領）六萬，損失不到一萬或不到一千元甚至並無損失的也可以報六萬。主管人自然無暇也無法去確實調查究竟損失若干，只好一律准予證明申報……」。這一段敘述很值得深思。

第三、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中的政治訴求問題。

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中的政治訴求集中地表達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特別是三十二條要求中。這些訴求歸納起來無非是反對貪污腐敗，反對濫用軍權，反對對台籍公教人員的歧視和差別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實現民主和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這些要求是根據當時台灣的實際情況提出的，並沒有超出地方自治的範疇。但是長官公署的報告，卻把它歪曲為「企圖使台灣脫離祖國而獨立」。楊亮功、何漢文的報告也說：「此項大綱提出後，不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範圍，且其叛國陰謀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筆者在「二·二八」期間一直在台北，沒有看過、聽過要求獨立的口號。事後走遍了許多城市和鄉村，也沒有聽過獨立的訴求。此次在第二檔案館中也沒有發現這方面的材料。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的小冊子封底倒有幾張似是而非的標語和照片。但仔細一看，就知道這不是台灣同胞寫的，而是國民黨當局爲了栽贓而製造出來的。相反地，筆者發現了不少「二·二八」是愛國運動的證據。例如高雄學生軍的傳單一再地強調：「我們是絕對沒有忘記愛祖國」、「我們絕對沒有忘記祖國愛精神」、「打倒腐敗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三月六日告全國同胞書說：「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外省同胞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熱誠來，和我們共同推

進。我們很誠懇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所有這些，使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第四、國民黨當局施行緩兵之計及大屠殺責任問題。

「二·二八」事變之初，在台北使用軍警進行了鎮壓。但因兵力單薄壓不下去，乃改而採取笑臉政策，允許成立處理委員會，並由長官公署派人參加，對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順，一概照單接受。但到了三月七日即翻了臉，把一切諾言推翻。三月八日晚由大陸派去的二十一軍及福州憲兵營一到達，大鎮壓、大屠殺就開始了。顯然，國民黨政府施用了緩兵之計。但在過去很長時間，人們不了解其真相。幾年前，筆者從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出版的《二·二八起義資料集》上集中，發現何漢文登載於《湖南文史資料》第四輯的題為「台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的文章，方解開了這個謎。何漢文在文中寫道：「二·二八」起義開始爆發時，陳儀以為問題不大，所以在他最初給蔣介石的報告中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由於市民與經濟警察之誤會，發生衝突，雖有少數奸徒，乘機滋事，致有死傷，旋即平息。」到三月二號，他看到羣衆起義鬥爭已如火燎原，席捲全省，才慌了手腳，把事變的釀成說成是由於「奸匪煽動，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之感情，勾結日寇殘餘勢力，致無知平民脅從者頗衆，祈即派大軍，以平匪氣」。……蔣介石……爲了搶救台灣這塊肥肉，立刻抽調二十一軍的兩師軍隊和駐福州的一個憲兵團限期開赴台灣，執行軍事鎮壓」（見該集一八二頁）。何漢文當時是監察院監察委員，由該院于右任院長加派參加楊亮功的調查。他是了解內幕的。上述資料集一八六頁何聘如

的文章，完全印證了何漢文的上述敘述。何聘如寫道：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早飯後，我（時任國民黨二十一軍副官處長，軍部駐江蘇昆山）剛走進副官處的辦公室，電話鈴響了，拿起聽筒一聽，原來是參謀長江崇林叫我馬上到軍長辦公室去開會，走進軍長劉爾卿的辦公室……大家圍著會議桌坐下後，參謀長即宣布開會。軍長手裏拿著電稿紙，對大家宣讀：「奉主席蔣電令」，大家照例一挺胸，軍長接著念道：「（一）台灣亂民暴動；（二）該軍全部開台平亂；（三）軍部及直屬營連和一四六師即日在吳淞上船直開基隆，一四五師在連雲港集結候輪開高雄，並限三月八日以前到達；（四）該軍到台後歸陳長官指揮」。由此可見，叫二十一軍開赴台灣實行軍事鎮壓的命令是蔣介石在三月三日晨之前下的。蔣介石的這道命令陳儀當然會馬上收到。所以，緩兵之計是蔣介石和陳儀共同演出的。須知蔣介石的命令和緩兵之計，害死了多少台灣民衆！蔣介石和陳儀一樣，血腥鎮壓「二·二八」民衆的罪責是難於逃脫的。第二檔案館的檔案中有招商局總經理徐學禹同陳儀之間的來往密電原件共七件。如徐學禹在三月二日就給陳儀發電有所獻策。三月五日徐學禹以極機密電告陳儀：「奉令由局派海辰及一〇三號登陸艇裝在滬二十一師師部及兵一團共四〇〇〇人約佳(九)日到基。另派一〇二號登陸艇去搭載憲兵六〇〇人約莫(十一)日到基」。三月六日徐學禹又以極機密電向陳儀建議：「可密請中央電令從嚴究辦，候海辰部隊到後……隨即漸取鎮壓態度……」。陳儀在三月九日給徐學禹的急密電中說：「奉主席寅齊防創耳電開：茲著二十一師之一四五旅海運台灣……等因，何日由滬起運，輸送計劃如何，祈告電示」。

招商局的這些密電原件是研究國民黨如何部署鎮壓「二·二八」的極寶貴材料。循此線索，應當可以從台灣當局的檔案中找出更多的相關歷史檔案。台灣當局公布這些檔案有助於澄清事實，分清責任，卸下歷史包袱。

第五、國民黨軍大屠殺的慘狀及台灣民衆犧牲人數。

這是「二·二八」的核心問題。今天國民黨要對「二·二八」進行平反，就應當把這個問題弄清楚。第二檔案館的檔案中這方面的材料可說付之闕如。台北的大屠殺是三月八日晚上開始的。當時筆者同周青兩人走在延平北路馬路上，忽然從背後響起了槍聲，回首一看，一隊國民黨兵已近在眼前，正發狂似地向行人開槍，筆者同周青急忙躲進一家旅館，才得倖免。我們倆很清楚地看到領著士兵往前走的正是國民黨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這說明，在「二·二八」前和「二·二八」中，與陳儀有矛盾的CC和軍統已經合流共同鎮壓台灣人民了。此後，白色恐怖持續了三天的說法是不對的，實際是持續了一週。這期間，馬路上根本無法行走，筆者一直躲在朋友家裏不能回家。等到一週後能出來行走回家時，筆者見到一路上都有蓋著席子的犧牲者的屍體，從萬華到幸町這一條路上，起碼有一百個以上屍體。以此推算全台北市被殺的，至少有一〇〇〇人以上。前述何漢文的文章說，「當時被殺得最慘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義、屏東等處。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對我說：『從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二五〇〇人以上。據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

說，『基隆大約死了一〇〇〇人左右』。據台中市市長黃克立、嘉義市長陳東生報告，單在市區郊收埋的屍首，在台中有八〇〇多具，嘉義有七〇〇多具。台北市除了二月二十八日一晝夜間被屠殺的人民有三〇〇〇多人外，以後每天陸續都有死亡。八日國民黨軍趕到後，陳儀對各學校的教員、學生實行大捕殺，在八、九兩日中被槍決的就有四、五十人。據楊亮功和台灣監察使署人員的調查估計，台北市民死亡在五〇〇人以上。據屏東市長龔履端的報告，市民共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縣市死亡大都在百數以上。在軍事大屠殺以後，接著由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當不下千數。……在台中有人告訴我，事變平息以後，在街道要衝地方，許多人家是全家死盡，絕了人烟。所以總計台灣同胞在這次起義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何漢文是被于右任派去參加調查的監察委員，能直接接觸陳儀和其他重要負責官員。他提供的這些數字都是各地負責官員提供的，應當說是可靠的。但何漢文說台灣同胞死亡的至少有七八千人。他只說是至少，那麼準確的數字呢？那只有向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特別是軍事單位、情治單位去索取。第二檔案館有楊亮功、何漢文三月二十四日給監察院于院長的電文內稱：「近查台省在此戒嚴期中，各方被擄失踪者甚多，人人均感惴惴不安，似此殊失收撫人心之道，長此以往，台局前途，至為可慮」。這份電報也說明了當時白色恐怖、濫捕濫殺到了何種程度。爲了弄清這個問題，台灣當局應該把長官公署報告中所提「爲求詳確起見由主管機關逐戶調查」的結果公布出來。如此材料不可得，筆者以爲可以採取分析人口統計的辦法。台灣自從日據時期以來，戶籍制度完備，人口統計精確，國民黨接收台灣後，一直

沿用這個戶籍制度直到今天。筆者曾聽熟悉台灣人口數字的人士說，一九四七年台灣省人口比一九四六年減少約六萬人。按常識，除非有特殊災害，人口是每年按一定比例增加的。一九四七年從台灣出去的有多少人，從外地進入台灣的有多少人，按道理應該是相差不多的。如軍隊也算在內，一九四六年底，從台灣開出了兩個師，「二·二八」當中從大陸開進去二十一軍的兩個師，人數當相去不遠，而且從福州開進了憲兵六〇〇人，在台灣軍隊總人數只有增加，不會減少。那麼，一九四七年台灣省人口減少的原因是什麼，其中在「二·二八」當中被屠殺的究竟多少，是應該能夠推算出來的。這方面，台灣的內政部和省政府應該負起責任，作出有誠意的交代。

「二·二八」迄今已近四十五年，「二·二八」對台灣人民來說是一場大災難。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有多少人被迫離鄉背井。而過去幾十年裏，談論「二·二八」是禁忌，人們敢怒而不敢言。到了五年前，這一禁忌方被突破。近來，台灣當局迫於民衆的強烈要求，決定平反「二·二八」，準備公布調查材料。這雖然來得太遲了，但仍不失為明智之舉。我們希望公布的調查材料能表現出誠意，做到客觀、公正，能還「二·二八」本來面目，以告慰「二·二八」英烈在天之靈。果真如此，對於化解省籍矛盾，穩定社會，將大有裨益。

最後，據筆者所知，丘念台先生在「二·二八」後即冒著風險組織受台灣當局通緝的蔣時欽（即蔣渭水先生公子）等人調查「二·二八」受害者，並親赴南京要求平反。此事在南京第二檔案館的檔案裏也有所反映。特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九九一年秋 於北京

吳克泰 宜蘭縣三星人，一九二五年二月生，就讀上海震旦大學經濟系、台大法學院，曾任台灣「人民導報」、「中外日報」、「自由報」記者。參加過沈崇事件「一九」反美抗暴大遊行。一九四七年，參與台北市二月民衆蜂起。

一九四九年四月，率「台灣青年代表團」至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嗣後在大陸長期擔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日語及日韓語組領導工作，一九七九年，參與對外經濟、貿易、投資的負責工作。一九八三年起，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各項領導性工作，並出任全國政協常委及「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指導性工作。

「二·二八」事變：起因·原型·本質和影響

周 青

引言

「溫故而知新」，這是古聖賢總結出來的「金玉良言」，也反映出某種社會現象的本質。

至一九九一年，「二·二八」事件雖然已經過四十五個寒暑，但台灣人民靈魂深處的創傷至今未癒。這個創傷所反彈出來的能量，始終影響著台灣政局的發展。請看幾十年來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也開始可以在台灣公開談論、公開紀念，甚至台灣當局也已成立「二·二八專案小組」和「二·二八研究小組」，而民間也成立了相應的類似組織。雖然阻力仍然不少，但是台灣當局準備「公布真相」和「平反昭雪」的計劃則沒有變動。

在這一重要時刻，重新檢討「二·二八」，探索這個創傷所潛在的物質能量，從而進一步認識今後台灣政局的發展、變化，是很有裨益的。

為紀念這次堪稱偉大的「人民蜂起」事件，我和吳克泰兄赴寧查閱中央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二·二八」的國民黨檔案。檔案雖然不全，但也可窺見整個「二·二八」的主要概貌。

「二·二八」事變：起因·原型·本質和影響

三一